



岭/南/理/论/视/野/丛/书

历史主义与 国际关系理论： 先秦中国体系研究

王日华 著

广东省出版集团
广东人民出版社



岭南/理论/视野/丛书

历史主义与 国际关系理论：

先秦中国体系研究

王日华 著

广东省出版集团
广东人民出版社
·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主义与国际关系理论:先秦中国体系研究/王日华著.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7
(岭南理论视野丛书)
ISBN 978-7-218-08880-8

I. ①历… II. ①王… III. ①政治制度—研究—中国—
先秦时代 IV. ①D69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67915 号

Lishi zhuyi yu Guoji Guanxi Lilun——Xianqin Zhongguo Tixi Yanjiu

历史主义与国际关系理论——先秦中国体系研究

王日华 著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人:曾莹

责任编辑:曾玉寒

封面设计:贾萌

责任技编:周杰 黎碧霞

出版发行:广东人民出版社

地址: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10号(邮政编码:510102)

电话:(020)83798714(总编室)

传真:(020)83780199

网址:<http://www.gdpph.com>

印刷:东莞虎彩印刷有限公司

书号:ISBN 978-7-218-08880-8

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28.75 插页:1 字数:420千

版次:2013年7月第1版 2013年7月第1次印刷

定价:60.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020-83795749)联系调换。

售书热线:(020)83791487 83790604

华夏主义是中国崛起的软实力重要的资源

(代序)

2011年8月，我的《中国崛起——华夏体系500年的大历史》和《华夏主义——华夏体系500年的大智慧》完稿，进入修改阶段，并在2012年送交出版社。在该稿即将出版之际，王日华博士请我为他将要出版的《历史主义与国际关系理论：先秦中国体系研究》书稿写一篇序言。我以前曾说过，我本人从不请人为自己的书稿作序，也不为别人写序。但这一次破了例。因为华夏主义的研究需要更多人参与和推广，而王日华博士的这一书稿也是这一研究的一个较有分量的成果。

在2012年这一年，我曾经在多个场合下介绍华夏主义的观点，其中有两部分内容正好可以为王日华博士的书稿助势。

在2012年12月15日中国国内发行量第一大报《参考消息》举办的论坛上，我作了《华夏主义——中国崛起的软实力资源》的发言。我在这篇发言中说：

崛起的中国将拿什么影响世界？

在经济上，中国正在打破，或者说即将结束西方主导的经济格局；在政治上、军事上，中国也都有重大的突破和发展，但是，崛起的中国又将拿什么文化、价值、观念影响世界？很遗憾，中国现在已经是一个经济大国，但是在西方主导的文化世界、观念世界、思想世界中，中国依然是一个文化小国、文化弱国。

为什么要提华夏主义？

我相信，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定会伴随着中华文明对世界的影响、发展和扩大。

中国在历史上长期是一个大国，它的大不在于经济、军事有多强大，更在于它的文化影响力。中国几千年的领先地位，更没有像西方强大起来，用武力、战争、毒品、大炮强行打开他国的大门，并用所谓“文明”的手段强迫其他“野蛮”国家接受西方的科学、民主、人权、自由等观念。在历史上，中国虽然也有过对周边国家使用武力和战争的情况，但中国在东亚的影响力，主要不是靠战争

打出来的，不是强迫其他国家被迫承认的。朝鲜、日本等国，都曾长期自动和主动地学习中国的华夏文明，中国从来没说你必须学我的文化才怎么样，是他们自觉在引用、模仿、复制中华的文明。

今天的中国什么东西能够被别人引用、模仿、复制？我想，我们正在建设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概念，已经包含了很多这方面的内容。但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明要成为一种具有世界影响的文明，必须要和我们中国本土产生的历史文化精华相结合。

在核心价值方面，在政治哲学方面，中国历史文化的精华是什么？我们长期以来缺乏科学和系统的梳理。胡适提出了整理国故以分“国纯”和“国渣”的问题，但很遗憾，这个历史性的任务没有完成。今天我们要继续做这一个问题。我以为，在核心价值方面，在政治哲学方面，中国历史文化的精华就是华夏主义。

华夏主义是什么？

在我看来，华夏主义是中国以老子、孔子、商鞅为主要代表的政治哲学的精华的综合。它既不是道家，也不是儒家，也不是法家。因为三家分开来看，它们都有重大缺陷，但是如果合起来，是一个非常好的可以用来治国的一个核心价值的完整的理念体系。华夏主义的核心概念有哪些？

比如，我们现在提的可持续发展观，是从西方引进来，把它本土化，然后引起东西方文明的共鸣。而实际上，是老子的自然哲学走在最前面。老子思想的核心概念是“自然”，运用到人类社会和自然关系上，就是人类要学会尊重自然、顺从自然、了解自然、认识自然，然后才能享受自然。用今天的概念，老子就是人类世界最早的1.0版本的可持续发展观念；自然概念运用到人类社会的治理上，就是无为而治，政府做政府应当做的事，百姓做百姓自然而然应当做的事，行使和享受自化自朴自富自正的权利和自由，同时又以自然而然的心态自律；评价一个社会的最高和最后的标准，就是“以百姓之心为心”，百姓对政府是不知有之，还是亲而誉之、畏之，还是侮之，就是好社会与坏社会的四种标准。老子最早揭示了中国历史上的公平正义的价值观，这就是老子提出损补抑举之道，由于人类社会存在高低贵贱之别，所以政府和社会必须学习天道以使“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如果你们问我一个问题，什么是最好的政治哲学？我的回答是老子的政治哲学比西方任何一家政治哲学都要好，都要到位。

孔子的思想体系中最有价值的内容是他倡导的人文主义、人本主义、人道主义和人才主义。孔子的仁学就是人学，人学在个人修身养性方面就是人的内心的道德教化，在国家治理方面就是以人为本，以民为本。后来汉初的贾谊曾经发挥以民为本的思想，提出了国以民为命，国以民为本，国以民为力，国以民为功等命题。从价值伦理层面上，以人为本和以民为本的思想，大大高于以资为本和以权贵为本的社会。一个国家的治理最终要落实到人的治理的层面上，因此国家的治理就是人才的治理，没有一大批德才兼备的人才，国家不可能发展和治理。人才的培育首先又是教育的普及，因此，孔子倡导的“有教无类”首开教育平等的先河。在一个教化盛行道德昌明的国家，才会出现和谐的社会。商鞅的核心价值观是以法治国，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一切皆按法断事，就是“使天下之吏民无不知法”，为了使法律能得到切实的执行，商鞅提出了独立的法律观的思想，在权与法的关系问题上，商鞅主张法治国家是“治不听君，民不从官”，权力高度集中与法律规范下的地方和民众自治并行。尽管商鞅的法治很粗糙，但其思想本质上是反专断、反暴政、反专制的。此外，商鞅思想中的富国强兵、中央集权与国家统一、重视农业农村农民、政治制度必须依时代变化而时时革新、破除贵族对政治权力的垄断而倡导以农功军功政功提拔人才的思想，也包含丰富的价值理念。

很遗憾，长期以来中国的历史文化中的精华与政治现实的结合比较弱，比较少，比较不自觉。什么是中国文化的精华？什么是我们民族文化最好的东西？我们没有经过像西方文艺复兴那样一个自觉的梳理、分析、批判、吸收、继承和改造。

中国没有这样一个梳理，我们要么全盘继承，独尊儒术，罢黜百家，要么全盘否定，把几千年历史文化贴一个标签叫“封建专制服务的思想工具”，并且加以否定。哪些是好的？哪些是坏的？哪些是最好的？哪些是不好的？我们不知道。

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建设一个文化强国，我们要有文化自觉、文明自信，那么这种文化自觉、文明自信从哪里来？

不认真地梳理中国历史文化精华，人们就不知道，又怎么去自信呢？所以，中国思想理论界做了很多工作，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提文化产业的发展。但是，文化产业的发展只是中国文化强国的一个方面。中国的文化产业再强大、再发展，你在国际上还是没有话语权。因为所谓的文化，归根到底，它核心的东西是

核心价值观。

中国能够提供什么样的价值观？实际上中国的历史文化的精华中是包括了不少很好的价值观念的。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些老子、孔子和商鞅的思想精华，直到今天还是非常有力量的，放在任何一个时代都不会错。我们党这些年提出了执政为民、依法治国、一切以人民利益为最高标准、一切从人民利益着想、人民利益是党一切活动的出发点和最终目标，我想，这些内容都是与中国历史文化中精华和国粹一致的。所以，我认为，华夏主义可以在丰富、补充、发展、完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中发挥重大的作用。

华夏主义这个概念，今天大家不熟悉，但是我想以后的过程中我们会越来越重视本土的那些优秀文化。所以，我们不要觉得这些文明离我们很远，它其实离我们很近。

今天当下社会里面最缺乏什么东西？最缺乏的就是法制建设，而商鞅的法制思想会对我们中国人理解什么叫法制提供一个参考价值。所以，你不要给它贴一个标签，说商鞅是什么？商鞅不就是为秦始皇、为秦帝国专制服务的一个工具吗？其实这个思想不对。

我们当下缺什么？各行各业都缺乏普遍道德观念的约束，所以我们才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食品安全问题、官员腐败问题。这些对于我们以前道德价值观念的倡导是有误导的，没有做好。

我想，我们中国的文化建设，尽管我们今天在世界文明里面话语权很弱，今天我们在经济上可以崛起成为一个第二强国、第二大国，但是我们看看我们的文化话语权，确实很小很弱，所以我们要自觉的、主动的去培育、去发展、去挖掘我们文明中的那些优秀概念，让更多的中国人更自觉地了解 and 知道中国文化中的精华，同时也要逐渐让西方人了解。这必将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的补充发展，也是一个创新的源泉。

2012年5月，我还有一篇没有被发表的文章，其中结束语部分谈到了华夏主义作为中国国家—国家间政治研究的中国范式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不同的主要特点：

笔者在《从华夏体系历史看美国国际关系理论范式的西方特色》（发表于《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2期）一文中，指出西方范式的二分法（国内政治与国家间政治二分、政治经济二分、政府民众二分、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二分）、见物不见人（强调权力、国家、利益等）、从抽象原则为逻辑思维的出发

点（人性善恶、国家中心、无政府状态、国家体系结构）等三大特点而言，作为国家—国家间政治的研究的中国范式，华夏主义范式与其有部分重叠（商子范式与西方的现实主义有近似内容，孔子范式与西方的理想主义有近似内容），但更大的特点是不同，即华夏主义作为国家—国家间政治的理论研究的中国范式是高度综合化、以人为中心、有原则但又高度灵活性。具体来说就是：

一是综合化、一体化。它是国家政治和国家间政治一体化，有单纯的国家政治，也有单纯的国家间政治，但重大的国家政治与重大的国家间政治实际上是不可分的，形成了与国家政治、国家间政治不同的国家—国家间政治（天下主义）概念。归结起来，适用于国家政治的重要原则，也适用于国家间政治。国家间政治首先应归于国家政治，国家间政治中那些大国崛起、大国权力转移、大国间的战争、大国国家间的关系秩序等一切重大事件的根本原因，都要归结于国家政治。它是政治—经济（货币财政）一体化，在宏观层次上，国家的政治经济是分不开的，经济是国家实现国内稳定的政治手段，也是达到国家间政治目标的重要工具（政治经济化，经济政治化）。国家—国家间政治的主体，即是政府（统治者），也是民众，政府—民众一体化。是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一体化。老子的无为而治是理想主义的，但顺势而为又是高度现实主义的；孔子的德治天下是理想主义的，但人才—君子治国，又是现实主义的；商子追求富国强兵是现实主义的，但希望达到以战止战，以刑去刑的目的又是理想主义的。

二是各范式都程度不同地重视人在政治领域中的作用，都把入，而不是抽象的国家作为国家—国家间政治的主体。人是人类社会一切活动的出发点和归结点，国家—国家间政治也不例外。而且这里的人，即是讲国家的代表统治者（老子的圣人，孔子的贤人圣人，商子的明君），也是国家的构成主体——民众，都强调民众在政治中的作用，国家—国家间政治的主体是统治者（政府）与民众的一体化。老子范式讲的无为政治，一方面是说统治者要克制“自见”、“自是”、“自伐”、“自矜”等劣行而不乱为，另一方面又提出统治者要“以百姓之心为心”，要“爱民治国”，要让百姓能“自化”、“自富”、“自正”、“自朴”。孔子范式从头到尾都在强调人，人讲得最多，作为国家政治和国家间政治的主体有三种：一是贤人圣人的统治者，二是辅助贤人圣人管理的有德性的君子，三是国家政治和国家间政治根本的民众，正如后来的贾谊所强调的国以民为本，功以民为本，力以民为本，并提出所谓德战即争其民、争其民心的方略。因此，国家—国家间政治的核心，都在“得人心”三字。也可以说儒家最早开启了国家

对民众的公共外交，把争取本国和他国民众的支持作为本国对外政策的组成部分。法家范式中被压在法之下，其愚民、役民、抑民的倾向相当明显（也是法家一大弊端），但即使如此，法家也强调民众在国家—国家间政治的重要性，如商子明确地指出“法者所以爱民也……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商君书·更法》，就是说如果能够是百姓得到益处，就不必去遵循旧的礼制，以法治国实际上最大的爱民。《史记·商君列传》。商子范式首先强调农民的重要性，国家政治的安定在农民，国家间政治的主要竞争力之一也在农民。

三是在方法上，老孔商都有抽象原则如“道”、“德”、“法”，但他们也都承认和强调历史、经验的重要性，都是历史—环境主义，认为国家—国家间政治都不是从某种抽象原则之上发生和演变的。老子之道虽然高度抽象，但他的道中包含环境因素，认为人类社会的政治离不开自然的大环境，人类自然中本身也包含了历史的因素；他的“势”基本上可以理解为国内环境和国际环境的综合；孔子更以过去曾经有过的夏商周三朝的历史文明为其政治的出发点，他的“仁学”即“人学”，高度强调历史与经验的作用；看似厚今薄古、否定历史的法家，实际上也是以过去尧舜文武的变革的历史来否定保守的历史，还是一种历史主义。正如商鞅所说，“圣人不法古，不修今……周不法商，夏不法虞，三代异势，而皆可以王”（《商君书·开塞》），“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故汤武不循礼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商君书·更法》）。在华夏主义的综合范式中，老子的道是最具有综合和宏观指导意义，他的尊道而行和顺势而为、人与自然的融合一体，为政治上的作为提供了一个总的方向和灵活性。法家的“法”在道的导引下形成法治的机制，法就是道在政治上的一种表现，依据具体的历史条件对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制度进行重大改革，采取各种与时迁移因物变化的具体措施，其实就是当时的一种“顺势而为”，只有以法治国和依法办事，才能真正做到无为而治，法治的精神既约束官吏，也约束最高权力者，在中观层面上形成一个无为而治的制度机制，没有人才、没有法治的道只能是空转的，不能实现。道家与法家都比较忽视人的主观作用和能动作用，孔子提供的君子—德治范式又在微观层面上为实现道家的无为而治和法家的依法而治提供了制度平台，就是通过选拔具有德性和自我约束力的君子到管理执行层面上，可以比较好的弥补两者的缺陷，在道、法、人才三个层面上实现国家的良好治理，达到治国平天下的目标。因此看似彼此矛盾的老孔商三大范式，实际上存在高度的互补性，你之所短正是我之所长，可以实现优势互补，以他之长补己之短。

所以，融各家精华于一体的华夏主义，形成了一个新的有机的综合体：尊道而行（高度的理想主义），顺势而为（高度的现实主义），选贤任能（人才竞争、教育竞争，君子—人才主义），以法治国（以道生法，政治经济军事的发展皆纳入法制轨道，高低贵贱皆从法，一切依法办事，辅之以德治国，法治主义），以人为本和以民为本（一切以民众的化、富、朴、正为国家—国家间政治利弊的评价标准，反对以资为本、以官为本），集道治、人治、法治为一体，集国家政治和国家间政治为一体，能为我们分析、研究、观察国家—国家间政治的本质、特点、发展趋势，提供一种新的、与西方的国家政治和国家间政治很不同的理论范式，即国家—国家间政治理论研究的中国范式。

王日华博士在北大读博士期间，我作为他的指导老师，并没有表达希望他也能从事华夏体系研究的愿望，因为我认为，一个学者能不能有所成就，有导师的指点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自己的兴趣。回想起10多年前我开始从事这一方面的研究时，从事这一领域的学者寥寥无几，要发表成果是比较不容易的，我的《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外交思想》完稿后由于种种原因只能在香港出版，发表的文章由于其观点还经常受到种种诘问。这一研究对许多人来说并不是香馍馍。它需要耐心、毅力，需要沉得下来，坐得稳，耐得住寂寞，更需要找到与几千年前的先哲们进行跨时空思想对话的乐趣之所在。

但王日华博士毕业后到广州工作期间，仍然继续从事这一方面的研究，并在这一领域发表了不少文章，尤其是他给我的这一部《历史主义与国际关系理论：先秦中国体系研究》书稿，在许多方面都有独到的特色和心得，这让我为他的执着和努力感到高兴，也让我感到很欣慰。

今天中国的崛起已经进入发展的第二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国软实力的问题，尤其是核心价值观的问题会更加受到人们的关注。加强对中国历史的黄金时期春秋战国的研究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自己的历史文化，并提升出更多有价值有现实意义的思想和主张。今天我提出华夏主义的主张很快得到了许多人的认同和支持。我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会认识、了解华夏主义这一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瑰宝。

是为序。

叶自成

2013年1月4日于北京

目 录

导 论 / 001

第一章 先秦国家间关系研究的体系观 / 014

第一节 古代中国的概念和主权属性 / 014

第二节 先秦国际关系研究的现状与困境 / 026

第三节 先秦国际关系研究的体系论视角 / 041

小结 / 049

第二章 先秦时期中国体系的基本单位 / 051

第一节 中国体系的基本单位及其历史演变 / 051

第二节 国家的消亡和身份认同 / 057

第三节 先秦国家行为体的主权属性 / 067

小结 / 075

第三章 先秦时期中国国际体系的生成 / 076

第一节 互动理论与国际体系的生成和发展 / 076

第二节 先秦体系的政治—军事互动 / 084

第三节 先秦体系的经济—文化互动 / 090

小结 / 096

第四章 先秦时期中国国际体系的结构 / 097

第一节 极论与国际体系的基本类型 / 097

第二节 结构理论与国际体系的分析方法 / 108

第三节 先秦国际体系的权力结构 / 120

第四节 先秦国际体系的制度结构 / 129

第五节 先秦国际体系的观念结构 / 137

小结 / 144

第五章 先秦时期中国体系的历史变迁 / 146

第一节 从部落体系到王朝体系 / 146

第二节 周王朝体系的稳定与变迁 / 153

第三节 春秋时期的王权—霸权体系 / 164

小结 / 175

第六章 王权衰落之后：周王国的存亡及其对外政策 / 177

第一节 东周时期周王国的衰亡 / 177

第二节 周王国及其王权衰落的原因分析 / 185

第三节 春秋战国时期周王国的对外政策 / 197

小结 / 204

第七章 脆弱的霸权：齐国霸权及其对外政策 / 206

第一节 春秋战国时期齐国的兴衰与灭亡 / 206

第二节 春秋时期齐国霸权的兴衰与对外政策 / 211

第三节 战国时期齐国的兴亡与对外政策 / 230

小结 / 236

第八章 霸权护持：晋国霸权及其对外政策 / 238

第一节 晋国的崛起与霸权的确立 / 238

第二节 晋国的霸权护持战略 / 245

第三节 韩国的衰亡及其对外关系 / 266

第四节 赵国的兴衰及其对外关系 / 269

第五节 魏国的兴亡及其对外政策 / 273

小结 / 277

第九章 霸权挑战者：楚国的兴衰及其对外政策 / 279

第一节 王朝体系中的楚国及其对外政策 / 279

第二节 春秋时期楚国与大国之间的争霸战略 / 285

第三节 战国时期楚国的对外政策 / 296

小结 / 301

第十章 大国崛起：秦国的兴盛及其外交政策 / 303

第一节 秦国的建立及其与王权的关系 / 303

第二节 春秋时期秦国的地区霸权与对外政策 / 307

第三节 秦国的统一战争与对外战略 / 313

小结 / 319

第十一章 霸权之间：中小国家的生存战略 / 320

第一节 郑国“小霸”及其对外政策 / 320

第二节 宋国的衰亡及其对外政策 / 329

第三节 鲁国的衰亡及其保守主义外交 / 338

第四节 吴越争霸中的外交战略 / 348

小结 / 353

第十二章 春秋战国时期国家间战争相关性的统计分析 / 355

第一节 春秋战国时期国家间战争史与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研究 / 355

第二节 春秋战国时期国家间战争的统计及其标准 / 361

第三节 春秋战国时期国家间战争相关性检验 / 364

小结 / 375

结论：历史主义与中国学派的国际关系理论 / 377

附录 春秋战国时期国家间战争及其编码 / 389

后 记 / 446

导 论

国际关系理论离不开历史。随着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输入中国，西方的历史也附着而来。然而，中国缺少的是国际关系理论，却并不缺乏国际政治思想和外交战略，更不缺乏历史。直到最近，中国古代国家间关系历史和思想才渐渐走入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视野。

一、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及其问题

国际关系研究在中国拥有很高的政治威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每次重大会议都会涉及对国际形势的考察和讨论，每次全国党代会报告都要分析判断当前的国际形势，重大国策的制定也总是建立在对国际形势分析的基础上。也正是如此，国际关系研究在中国总是给人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

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年间，国家外事部门所属的研究机构成为中国国际关系与外交研究的主要阵地。建国前后，中央制定了严格的外事纪律，“外事无小事”，国际关系和外交成为中央决策层和外交执行层的专属领域。国际关系与外交的特殊地位使得任何对其独立性的研究都存在一定的政治风险，学者一般都尽量避开这一学术领域。“不在其位，不谋其政。”^①

改革开放以后，“思想解放”的浪潮打开了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大门。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务虚会上将国际政治研究作为一个紧迫的政治任务提出来，他说：“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为此，邓小平提出了社会科学研究的两大基本方针：“一定要坚决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一定要坚决执行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的方针”。^②正是在这种思想和政策指导下，国内各个高校和科研机构积极开展国际政治与外交研究，从而出现了

^① 《论语·泰伯》。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5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0—181、183页。

新中国第一代国际关系与外交研究的学者。中国的国际关系与外交研究也开始出现了由政府层面走向科研层面。

学术界一般把1919年英国威尔士大学设立国际关系教授职称并开设国际关系课程视为国际关系学科形成的标志。在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知识谱系中的主体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尤其是美国国际关系理论，所以，国际关系学一度被说成是“一门美国的社会科学”。^① 20世纪80年代过后，刚刚兴起的中国国际关系学研究主要集中在引进和学习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

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全面展开已有三十余年，中国引进和学习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也持续了三十多年。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层出不穷，引进没有尽头，学习永无止境。引进的目的在于快速地缩短中国与西方的差距，通过学习、消化和吸收，进而有所创新，并最终实现超越。但是，三十多年来，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与世界学术界的差距似乎陷入了某种怪圈：引进之初有所缩小，引进之后跟不上理论更新而重新扩大；再引进，再扩大。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仍旧处在理论贫困之中。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不仅大部分已经被引进和介绍完毕，而且，随着国人英语水平的提高、出国留学人数和海归人数的增加、各大图书馆馆藏西方文献的增加以及网络发展带来的便利，中国人已经可以更加容易获得西方文献并且可以自己阅读，简单的引进和介绍已没必要。

学术界对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不断反思。孙学峰博士对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现状进行了实证分析，他发现：对国际关系现状的研究是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重心，而研究人员对国际关系问题本身作出理论探讨的努力明显不足，研究成果数量有限，还没有建立起独立的理论体系。^② 门洪华博士认为，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主要存在两大问题：第一，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缺乏创新性。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学理探讨数量太少，而且纯学理探讨的文章绝大多数是描述性成果，旨在对国外国际关系理论成果进行评介，推理性成果少得与其不成比例，原创性推理成果更少；二是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主要是从西方引进的，但创新成果少得可怜，中国对传统民族文化的挖掘不够。第二，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缺乏科学性。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仍然停留在主

^① James Der Derian (ed.), *International Theory: Critical Investigations* (London: Macmillan, 1995), p. 212.

^② 孙学峰：《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现状分析》，载《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第7页。

观认证（或传统主义）阶段，缺乏严格的科学性；在研究的精度、分析的深度和广度、提出和思考问题的学问方式上，仍然没有体现观念更新，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甚大。^① 许嘉博士总结了20世纪末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归纳了其中存在的问题：总结介绍多于理论创新；在对理论研究方法认识上的混乱；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和国际问题研究相脱节；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尚无一支稳定的学科队伍。^② 苏长河博士注意到，现在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特点是无理论而急于建设理论的心态。^③ 此外，国内众多学者还对中国国际关系与外交研究的发展历程、学科建设、学术规范和研究导向等问题进行了反思。^④ 国内学术界普遍感受到了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贫困和焦虑。

二、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论争

一种传承已久的自尊心和使命感总在驱使着中国人发出自己的声音。20世纪90年代以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呼声此起彼伏。

① 门洪华：《关于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现状的评估报告》，载《欧洲》2002年第3期，第96—97页。

② 许嘉：《20世纪末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载《世界经济与政治》1999年第6期，第44—45页。

③ 苏长河：《问题与思想：再谈国际关系研究在中国》，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3期，第29页。

④ 王逸舟：《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回顾与前瞻》，载《改革》1999年第1期，第78页。俞正梁：《中国国际关系的战略转型与理论研究20年》，载《欧洲》1997年第6期。资中筠：《国际政治理论探索在中国》，载《国际经济评论》1998年第6期。秦亚青：《国际关系学和中国国际关系研究》，载《亚洲评论》1999年春季号。王逸舟：《面向未来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载《东亚季刊》1999年第2期；《中国大陆国际政治理论研究的若干问题》，载《东亚季刊》1999年第3期；《面向新世纪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若干思考与建议》，载《世界经济与政治》1999年第4期；《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对成就与缺失的几点感受》，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4期。王丽萍：《中国国际政治研究五十年审视》，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4期。许嘉：《九十年代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扫描》，载《国际观察》1997年第6期。苏长河、彭召昌：《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贫困：对近20年国际关系学在中国发展的反思》，载《世界经济与政治》1999年第2期。苏长河：《中国国际关系学问题与研究方向》，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年第1期。楚树龙：《关于国际关系学学科建设的几个问题》，载《现代国际关系》1995年第4期。庞中英、张永胜：《国际关系理论在中国的问题与前途》，载《国际论坛》2002年第1期。张历历：《新中国外交学学科建设与研究》，载《外交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孙学峰：《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骨干力量与流派分野》，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3期。朱锋：《国际关系理论在中国的发展问题与思考》，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3期。张睿壮：《我国国际关系学科发展存在的若干问题》，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5期。陈岳、李永成：《国际关系学：进展与问题》，载《教学与研究》2003年第12期。本刊编辑部：《近年来中国关于国际政治若干问题研究综述（上、下）》，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6、7期。

梁守德教授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的首倡者,^①他认为:“国际政治学的中国特色,指的是立足中国,面向世界,从中国的角度研究国际政治演变和发展的客观规律。”^②1994年5月,北京大学还专门举办了一次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为主题的研讨会。

然而,并非所有国内学者都认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命题。一部分学者对此持怀疑或否定的观点。资中筠认为,理论学家应该往前超脱于自身所属的国家或集团的利益,理论是客观的,可以有各种学派,但应该无所谓属于哪个国家。因此,从原则上不宜强调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③阎学通教授也表示,国际关系理论是普世性的,国际关系理论本身是没有国家性质的,因此以创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为目标是无法实现的。^④庞中英和张胜军博士均表示,不赞赏“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的说法,认为最好不要提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⑤

有学者对“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的观点提出了修正:一是缓提“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王逸舟教授坚信:“中国这样的大国必须有,也肯定会有独具特色的国际政治观”,^⑥但是,他倾向于在现阶段少将或尽量不讲,尤其是不要讲“有特色的体系”之类的话。^⑦张睿壮博士认为,此论言之太早,“只凭一些与西方不同的观点就虚张声势地推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政治理论’,其浮躁之心可见一斑,只能贻笑大方”^⑧。他表示,关于中国特色的提法是可以的,但前提是要踏踏实实进行理论研究,等有了创新性的理论研究成果,

① 梁守德:《关于中国外交学的中国特色的探讨》,载《外交学院学报》1993年第3期,第51—55页;《试论国际政治学的中国特色》,载《国际政治研究》1994年第1期,第15—21页;《国际政治学在中国:再谈国际政治理论中的“中国特色”》,载《国际政治研究》1997年第1期,第1—9页;《论国际政治学理论的“中国特色”》,载《外交学院学报》1997年第2期,第40—46页。

② 梁守德、洪银娴:《国际政治学理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1页。

③ 资中筠:《国际政治理论探索在中国》,第41—44页。

④ 阎学通、徐进等:《王霸天下思想及启迪》,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版,第292—293页。

⑤ 庞中英、张永胜:《国际关系理论在中国的问题与前途》,第38—39页。

⑥ 王逸舟:《中国国际政治理论研究的几个问题》,资中筠主编:《国际政治理论探索在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8—19页。

⑦ 王逸舟:《当代国际政治析论·写在前面》,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页。

⑧ 张睿壮:《我国国际关系学科发展存在的若干问题》,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5期,第70—73页。